



王干主编

雾湿葡萄波尔多 汪曾祺地域文集·张家口卷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雅俗文野在他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



徐强一选编

广陵书社



王干主编

雾湿葡萄波尔多

汪曾祺地域文集·张家口卷

徐强一选编



一年客易又秋風
九月十日 曾祺直照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湿葡萄波尔多：汪曾祺地域文集·张家口卷 / 徐强选编. — 扬州：广陵书社，2017.4

（回望汪曾祺 / 王干主编）

ISBN 978-7-5554-0739-3

I. ①雾… II. ①徐…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6405号

书 名 雾湿葡萄波尔多：汪曾祺地域文集·张家口卷

编 者 徐 强

责任编辑 金 晶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jss@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739-3

定 价 42.00 元

前 言

“回望汪曾祺”丛书的《夜读汪曾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汪曾祺诗词选评》《汪曾祺论沈从文》《我们的汪曾祺》前五种出版后，得到了广大“汪迷”和读者朋友的肯定和喜爱，作为汪老家乡的出版社，我们深感荣幸，也深受鼓舞。今年是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被遮蔽的大师”，在汪曾祺长子汪朗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丛书主编王干先生的积极运筹和诸位作者的精心编撰，我们得以再次奉献九种“回望”系列，包括金实秋创作的《泡在酒里的老头儿：汪曾祺酒事广记》、庞余亮选编的《汪味小说选》、陈武选编的《林斤澜谈汪曾祺》、王树兴选编的《高邮人写汪曾祺》、陈武创作的《读汪小札》等五种，以及由汪曾祺研究专家徐强按地域重新选编的汪老作品：《梦里频年记故踪：汪曾祺地域文集·高邮卷》《笳吹弦诵有余音：汪曾祺地域文集·昆明卷》《岂惯京华十丈尘：汪曾祺地域文集·北

京卷》《雾湿葡萄波尔多：汪曾祺地域文集·张家口卷》四种。

汪曾祺先生作品已成为读者心目中百读不厌的经典，对于汪先生作品的探究也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显学。

“回望汪曾祺”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丛书，我们还将陆续推出新的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向一代文学大师和扬州乡贤致敬，同时也恳请广大作者和读者不吝指教。

广陵书社编辑部

2017年4月

序：汪曾祺的文学地图

唐代诗人杜甫，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开元盛世和战火绵延的安史之乱，杜鹃啼血书写王朝的痛史，成就了一代“诗史”之美誉，也深刻地诠释了“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哲理。老杜的创作生涯，是和他的履踪分不开的：三次壮游时期，吴越、齐赵、梁宋；十年困守时期，长安；陷贼与为官时期，奉先、白水、鄜州、凤翔、华州、秦州、同谷；漂泊西南时期，成都、绵州、梓州、阆州、夔州、江陵、公安、岳阳、潭州、衡州……文学史上关于老杜的时段划分，正和其地理的迁移严密对应。

宋代文学家苏轼一生流寓，足迹同样遍布华夏二十余州，晚年作六言诗《自题金山画像》，二十四字道平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二十余州的代表，也是他多舛际遇里最为仓皇的三个地点。它们的连线，缩微着苏轼六十四年的大起大落的风波图。

其实，岂独老杜、东坡为然？翻阅文学史，会发现每个作家

的平生，都是一个独特的时空结合体，或曰一个时间和空间交织形成的坐标系；“情因事迁、文随地转”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汪曾祺也不例外。笔者曾借《汪曾祺年谱长编》^①一书的撰述，力图“为生性散漫、不记日记的汪曾祺还原出一部可信的生活史和创作史”。在《年谱》中显现的汪曾祺一生，呈现出鲜明的时间阶段性，而这一阶段性与其寄身的地理场域又有着密切的统一关系。谱中既已以时间为序予以缕述，现在《汪曾祺地域文集》4册面世，为我们从空间角度对“作家地理”与其人格结构及艺术嬗变过程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汪曾祺一生尊崇高邮乡先贤、宋代大词人秦观（字少游），秦观的名字隐含着地理上的“游”走、“观”览与艺术创作之间的隐秘联系（无独有偶，宋代大诗人陆游字务观，也是异曲同工）。汪曾祺本人也雅好四方行走、随处流连，在他77年的人生中，履踪几乎遍及全国。以目前包括港澳台在内的34个省级行政区而言，汪曾祺未曾到过的似乎只有青海、宁夏、澳门3个省区。其中很多是走马观花性质的路过，虽然大多也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记载和反映，但就像作者自云，“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②。即便如此，他的记游之作总体上也是当代游记文学中的佳品，其以独到眼光，对不同地域的景色、风物、民俗、方言饶有发现，具有丰富的人文地理学意义。

① 待刊。简编本《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版。

② 汪曾祺《我的世界》（1993）。

不过，真正对汪曾祺的成长具有塑形作用的，无疑是居住时间最长的四个地方——高邮、昆明、北京、张家口。这套《地域文集》，就是打破时间和题材界限，专从空间角度类编而成的四地文集。这种类编勾画出一幅空间界限分明的版图上的四大地标。

首先是高邮。高邮地处苏中，属于“淮南江北海西头”的扬州地区。这里是吴越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而以吴越文化为主调。高邮又是大运河流经的关键之地，运河在沟通高邮与南北文化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汪曾祺身上受儒家的影响很深，但也应看到，高邮文化中同样存在的儒家之外的很多异质因素也同样濡染到他，例如，他的小说、散文中的主人公涉及五行八作，反映出这里浓郁的重工商主义传统。在温柔敦厚之外，高邮传统中的人生意识、道德观念似乎沾染水的特性，比纯粹儒家传统更为灵活、灵动。汪曾祺在高邮出生并生活至19岁，1939年离开，1981年在阔别40年后才第一次归里。作为其出生和早年的成长受教之地，高邮毫无疑问是汪曾祺人格的奠基之地。在此生活期间他还没有展开其艺术生涯，但是已经饱受民风和文化传统的浸润，养成朴素的审美观。很自然地，高邮生活成为其一生写作最重要的题材来源。在他的第一创作阶段里（20世纪40年代的写作），故家还未明显成为其属意的重心，《邂逅集》所收8篇小说，只有《鸡鸭名家》算典型的早期高邮生活背景，从最近发掘出来的30余篇早期逸文来看，其中明确为高邮背景的也只有七八篇而已。^①但经过长期感情酝酿发酵，在1980年代复出

① 参苏北选编《汪曾祺早期逸文》，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文坛的第一个代表性作品，恰恰就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①的《受戒》。1982年结集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中新写的4篇力作都是关于故乡的，1985年结集的《晚饭花集》中，在总共31题中，高邮题材的占到18题之多。小说是这样，散文亦复如此。可见，就像他自己在诗中所写的那样，“乡音已改发如蓬，梦里频年记故踪”^②，越到晚年，高邮越成为其最重要的灵魂家园和艺术领地，无论在取材自觉上，还是挖掘深度上，他的故乡书写都达到了新的境界，极好地诠释了“童年记忆”在艺术家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也成为中国现代“小城叙述”的一个典范。

其次是昆明。这里是汪曾祺的人格定型期和艺术学徒期（1939年至1946年）的生活、读书之地。汪曾祺认昆明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气质中的很多方面，与昆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苍山洱海让他欢欣流连，亚热带高原的独特物候风情让他目不暇接。掺杂着耗子屎和砂石粒的“八宝饭”和文林街偶饱口福的米线、饵块哺育了他青春的身体，凤翥街上的三教九流让他体验人间万象。作为战时文化教育中心，昆明集中了中国知识界精英，也是自由包容的精神大本营。他谈到西南联大的影响，曾说最重要的是使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又如他人格中有强烈的“名士气”，

① 考诸史实，四十三年前的1937年，作者正在江阴读高中，情窦初开，有了甜蜜的初恋，“旧梦”当与此有隐秘关联。但小说的地理背景，毫无疑问是故乡高邮。

② 汪曾祺《回乡书赠母校诸同学》（1991）。

究其原因，除了来自扬州八怪等苏中文化传统的影响，战时昆明文人集团中的“名士文化”（想想汪曾祺笔下的闻一多、刘文典、金岳霖、曾昭抡、陶光等一大批名士）尤不可轻忽。他在昆明遇到了自己终生追慕的艺术导师沈从文，聆听了一批大师级学者的课程，不无随性地浏览了古今中外典籍，形成开阔的艺术眼界和相当的学术功底，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气质与风格，这里堪称其取之不竭的精神堡垒和艺术武库。当年离别时依依不舍，人到暮年又一再重游。他自己说：“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① 他在晚年创作大量以此段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散文，凸显了昆明生涯在汪曾祺人格和艺术中的重要地位。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一股“民国热”风潮的兴起，民国时期各著名大学的学术教育成就引起读书界的热切追慕，就中以战时的西南联合大学最为人称颂。寻绎这股思潮之源，汪曾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不断的西南联大书写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事实上，诸如中央大学、浙大、川大、厦大、复旦等其他高校成就也不小，为什么西南联大能独秀于林，最为人津津乐道？汪曾祺以亲历者身份，在散文、小说中不乏传奇、夸张、幽默的描述，对于传播和普及西南联大史事，实有无可取代的引领风潮、推波助澜之功。

本来上海也是汪曾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驿站。1946年夏天，汪曾祺随复员大军回到上海，居住到1948年初离沪赴北平，在这

^① 汪曾祺《七载云烟》（1994）。

战后的东方大都会短暂寄居谋生两年半的时间。上海可谓其真正踏上社会的第一站。期间他寄身文教界，阅历战后万象，体察世道人心，迎来小说创作上一个小高潮。但总体来看，写上海背景的分量偏小，一篇作品中局部地写到上海背景的虽不少，而纯以此地生活为题材者似只有《星期天》（1983）一篇，“上海卷”阙如，这也是不无遗憾的事。

上海以后，是北京。从1948年北来谋生，在此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编刊物、写剧本，写小说、写散文，直到1997年终老于斯，汪曾祺近50年的光阴在北京度过，在四地当中，以此地最久。汪曾祺北来的初衷是为追随未婚妻施松卿，但下面几方面因素恐怕也不能忽略：北京作为华北大都市和著名古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京派”文学的发祥地，西南联合大学的人文群体在战后也回迁至此，其中包括他的文学导师沈从文，以及在西南联大时期结下的终生好友朱德熙、李荣等。在汪曾祺初来时，这里是战后百废待兴的文化中心，不意稍后却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对于在师承和趣味上都有“远离政治”因子的汪曾祺而言，北京的意义是复杂的。汪曾祺的北京寓居分两个阶段。1948年至1957年是第一阶段，其间他只有少数散文、特写和戏剧的试笔之作。究其原因，主要是个人艺术路向和时代大势的矛盾。以政治为轴心的文艺主潮，使汪曾祺的艺术趣味、文学理想失去依附，既成的、相当个人化的艺术风格难以为继，要想“随流”，必须经过艰难的转轨、蝉蜕。在找到稳妥的转轨方式之前，唯有沉寂暗哑，休笔转业。当然恩师沈从文的矛盾处境之镜鉴也是一个因素。他虽未成为“专业作家”，但职业始终没出艺术界，没有脱离文字

生涯，在《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当编辑，对中国说唱艺术的广泛而深入接触和积累，以及与老舍、赵树理等民间市井趣味甚浓的作家的朝夕盘桓，激活了汪曾祺心中似乎早已消泯的民间兴致，使他在传统与民间文学方面增加了厚实的积累。编辑生涯不意间成为汪曾祺的一个漫长的艺术发酵期。此前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膜拜西方现代主义，醉心象牙塔里的先锋实验；60年代后他回归民间与传统，中间似乎有个鸿沟，其实不存在什么鸿沟——正是在这个漫长的发酵期里，他实现了艺术上“暗转”式的跨越。

不过说到此期不多的作品中的“北京书写”，却也是非常精彩。《卦摊》是1948年刚到北京不久所写，描写东安市场的市井万象已是穷形尽相；进入新中国时期的《一个邮件的复活》（1951），虽只是篇特写，但以其圆熟的叙事技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国子监》（1957）是此期散文代表作，娓娓道来，显示汪曾祺对古都历史文化的认知已达到熟稔程度。

人有旦夕祸福。1958年下半年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当年被发配张家口劳动改造，一去三年，他的人生地图上出其不意地增加了张家口一站。

张家口地处冀西北，蒙古高原南边缘，海拔极高，春季干燥，风沙肆虐；夏季炎热短促，冬季寒冷而漫长，气候条件远比北京为恶劣。汪曾祺曾奉命画《马铃薯图谱》的沽源位于张北地区，原为一座军台（清代所设军用邮驿），官员触罪，往往被皇上命令“发往军台效力”，实为一种严酷的贬谪。汪曾祺在随身带来的一本书扉页上画了一方闲章“效力军台”，虽为半开玩笑，但推人及己、“有迁谪意”的感怀也是很明显的。

张家口劳动生活，可以说是汪曾祺迄当时为止，也是其一生中的最低谷，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未尝不是上帝的馈赠。正是在这里，汪曾祺平生第一次较长时期深入到民间生活，也第一次从生产实践和切近交往中认识到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①

对汪曾祺而言，张家口是流寓地，亦是避风港。和很多右派作家相同，他从起猪圈、刨冻粪、扛粮食等沉重的劳动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但又和他们不同，农科所对北京来的“老汪”没有歧视，给他保留了起码的尊严。塞上高原收容了落难者，虽然紧张的政治斗争和沉重的生产劳动为张家口生活涂抹上压抑的底色，但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却是快乐的劳作、温馨的生活、健康的人性、动人的世间真情。口外生活成为1960年后汪曾祺写作的重要题材之一。他歇笔十几年后，在1961年忽然写出大受好评的《羊舍一夕》及后来结集的《羊舍的夜晚》中的其他篇章，这绝不是偶然的。新时期复出后最早的一批小说（《塞下人物记》《黄油烙饼》《寂寞和温暖》《七里茶坊》）和80年代后的大量散文也都是以此为背景的。他发自内心地歌唱这里劳动的美，人情的美，从严峻的现实中发掘出宝贵的诗意：

^① 汪曾祺《随遇而安》（1994）。

登上高凳，爬上树顶，绑老架的葡萄条，果树摘心，套纸袋，捉金龟子，用一个小铁丝钩疏虫果，接了长长的竿子喷射天蓝色的波尔多液……在明丽的阳光和葱茏的绿叶当中做这些事，既是严肃的工作，又是轻松的游戏，既“起了作用”，又很好玩，实在叫人快乐。^①

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②

我在这里的日子真是逍遥自在之极。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③

1983年重访故地，他写下不止一首诗篇：“或绑葡萄条，或锄玉蜀黍。插秧及背稻，汗下如蒸煮。偶或弄彩墨，谱画马铃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人或谓饴甘，我不厌荼苦。身虽在异乡，

① 汪曾祺《羊舍一夕》（1961）。

② 汪曾祺《随遇而安》（1994）。

③ 汪曾祺《沽源》（1989）。

亲之如故土”^①；“北国山河壮，西窗客思深。重来谴谪地，转能觉相亲”^②。这都是他对塞上高原的深情的流露。盘点汪曾祺的张家口题材写作，很明显看出汪曾祺和张家口有一种相互馈赠的关系，一方面，张家口填补了汪曾祺的阅历空白，磨练了他的意志，丰富了创作题材，正如他所曾自言：“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从一个作家成长成熟的角度来说，这绝非戏谑之语。另一方面，从张家口的角度来说，汪曾祺这样一位文坛巨擘曾在这里生活并写下大量有关它的作品，这本身就是张家口当代人文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61年底结束张家口的生活，开始了北京生活的第二阶段，直到逝世。这一阶段又以“文革”结束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专注本职工作——他归京后供职于北京京剧院，很快以其非凡才华受到高层人物的注意和耳提面命，从右派和反动权威的身份阴影下解脱出来，作为核心笔杆子参与《沙家浜》等的创作。这是他一生中和政治结缘最深的时期，一方面风光无限，一方面如履薄冰。自然，这期间的写作除了集体创作，个人化写作完全消歇了。但剧院经历对此后的写作大有意义，其一，为后期大量的梨园题材作品打下厚实的基础；其二，戏剧创作经历使他谙熟传统艺术精粹，为打通艺术门类的壁垒、建构精湛的文论思想创造了条件。后期是“文革”结束，从政治文化漩涡里走出的汪曾祺，

① 汪曾祺《重来张家口，读〈浪花〉小说有感》（1983）。

② 汪曾祺《重来张家口》（1983）。

重新回归小说、散文创作，异军突起，在60岁成为“文坛新秀”，从此一发不可收，将近20年间创作数百万字，迎来艺术上的丰收期，成为新时期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章节。北京这座他生活了30年、有着久远历史文化传统的北方大城市，从1980年的《天鹅之死》开始，也成为不断书写的对象。他虽曾拒绝承认自己为“京派”，但无可否认地成为1993年出版的《京味小说八家》^①中的一家，更无可拒绝地被冠以“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个传人”的名号而进入若干版本的文学史著。《京味小说八家》编者在《后记》中阐述了“京味”的内涵，指出“京味”由三种因素所构成：乡土味、传统味、市井味。“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是：（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可见，高邮人汪曾祺已然从骨子里成为一名“北京作家”了。

汪曾祺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1920年，卒于新旧世纪之交的1997年。70余年间中国政治风云际会、文化消长嬗变的线性历史，在他人生曲线图上投影为上述五个地理空间。通观汪曾祺的艺术人生，可进一步简述为：出生在高邮里下河地区，在运河文化里成长，接受人生最早的文化和人格熏陶；在战时昆明的学院环境中初登文坛；战后短暂的上海寄居，阅历职场沧桑和大都市的世相百态；新中国前半期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艺术追

① 刘颖南、许自强编《京味小说八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选收老舍、汪曾祺、刘绍棠、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浩然、苏叔阳八位作家的小说，每人两篇，共计16篇。汪曾祺入选的两篇作品是《安乐居》和《云致秋行状》。

求受到政治环境格限而辍笔；“反右”斗争到“文革”结束，经过“北京—张家口—北京”，人生曲线则历经“平和—跌落—荣华—沉寂—复归”的戏剧性沉浮，终于“大器晚成”，在新时期文坛一举成名。看似简单的这幅轨迹图却容纳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几类代表性空间，包孕着一个小说家人格文风递嬗的密码，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汪曾祺、思考艺术家“人地关系”的另一个角度。

本套书初由王干先生动议策划，委托笔者提出选目。胡婉君、何希负责文本合成，并参与篇目筛选。若有不当之处，皆由笔者负责。

谨以此书纪念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徐 强

2017年4月15日